

# 当代中国的市场发展与社会生活：基于省际差异的比较分析

陈福平\*

**摘要：**本文通过对各地区之间市场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发育之间关系进行研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从而带来了人们自主能力的提高，使得公民社会的发展成为了可能。然后当我们把这种自主能力控制了之后，从宏观的表现上看，公民社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一种抑制的效应。因此，公民间的相互合作和参与网络的建立，不应该仅仅表现为一种参与能力的提高，从国家制度的层面上看，也需要给予更多的政策，真正完善参与的制度化以及提高人们之间的合作精神，从而真正推进公民社会健康有效的发展。

**关键词：**市场经济 公民社会 自主能力 社团参与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社团参与一直被视为市民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因此在国内外的学术界都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学者都注意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社团参与水平是不一样的(Almond&Verba,1963;Putnam,1993;Wuthnow,1991)，而背后的原因则具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在当代中国，许多学者提出市场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们的个体自主能力的提高，尤其是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从而带来市民社会的出现，人们也将具有更高的社团参与水平。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市场的发展对市民社会也存在着某种抑制性，例如机会主义的出现、合作传统的遗失、社会信任的降低等等因素。因此，本文将讨论的问题是，市场发展是否带来了人们社团生活的繁荣，其中又是有哪些可能性的因素对这种繁荣抑或衰弱产生了影响，同时在本文中也将对当代中国各个地区间的社团生活进行比较分析，进而阐释宏观层面的市场发展对人们社团生活差异造成的影响。

## 一、市场化背景下的市民社会：一个争议的话题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到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也逐步提高。这一切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国家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在中国将逐渐出现一个类似与西方公民社会的社会状态。对于公民社会的理解，虽然不同学者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解释，但是其理解公民社会的特征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1）市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或私有产权为基础的；（2）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关系；（3）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关系；（3）市民社会遵循法原则（4）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5）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6）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进程（邓正来，1999）。从市民社会的特点上来看，对于中国而言，市场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发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一些国内学者也乐观的提出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发展基础，不断地创造着其发展的良好空间（方朝晖，1999；高兆明，1999；储建国，1999；田忠，2001；俞可平，2006；张喜红，2007）。然而，也有学者提出一种批评的意见，陶传进认为“虽然市场经济有助于消除专制集权控制，为社会成员自由的社会活动创造空间，但是它却无法提供社会价值的产生空间，也不能培育出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合作精神与公共责任感。相反市场的内在运作机制所具有的恰恰是对它们的损害作用和对社会成员原子化与机会主义倾向的诱发”（陶传进，2003）。因此对于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成为了一个我

---

\* 陈福平(1982 - )，男，福建南平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chenfuping1224@tom.com](mailto:chenfuping1224@tom.com)。

们需要在理论与实践进一步思考的焦点。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争议的双方对于市场经济对于公民或市民个体的自主空间的理解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清楚的阐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将给予了人们自由参与社会生活的空间。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平等契约关系上的经济，这首先要参与的行动主体拥有人身上的自由权利和能力，“因此只有在个人能够自由行使他们的天赋权利时，公民社会才能繁荣起来。为公民社会形成提供机会的是市场而不是国家，因为个人满足自然欲望的能力受到限制时只能通过商品交换来超越”（托马斯·潘恩，2005：112）。溯及到更早的黑格尔那里，公民社会是物质生活条件的领域，是自然必然性的产物。在公民社会里，各个人是以自私的物质利益联系起来的，从本质上说，公民社会就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换领域”（黑格尔，1961：124）。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是使得人们物质利益关系活跃起来的重要社会机制之一。事实上，当我们考虑到中国经济转型的更大背景中来时，这种个体自主能力的解放也内涵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变的特征。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体制对整体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单位常常是主导的因素，居民都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个人自主空间往往有限，因为计划经济不仅是对物质产品的计划生产，也是对人和人的生活的生活的计划安排。而市场经济建构起来以后，产品和人都无法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安排了，人在市场上活动，需要自己选择，没有人能够代劳。要选择，就要求自主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就不需要也难以接受被动的安排。人在市场上形成自主性，必然会带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当社会越来越充分地国家垂直体制中分化出来的时候，个人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自由空间和自主支配的资源；当社会内部进一步分化的时候，人们的兴趣、利益、地位也都在分化，于是就有越来越普遍的“人以群分”的结社（高丙中，2006）。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学者们都认同的一种假设，就是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自主性得到了提高，从而带来了公民社会的推进。

而争议双方的焦点则产生在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带来了人们相互关系的融合上。事实上从齐美尔等古典社会学家的讨论开始，就引发了一种对于商品与市场经济发展对于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反思。齐美尔认为货币经济和主导精神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在对待人和事物时都采用实用主义态度，而且在这种态度中，形式公正经常与不为他人着想的冷漠结合在一起。货币借助“多少钱”表达了所有物质之间的不同。货币以它那无色彩性和中立性而变成了所有价值的共同单位，它不可避免地挖空了事物的核心、个性、特殊价值和不可比性。这种冷漠的结果是，我们甚至经常不能清晰地知道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邻居的那些人（齐美尔，2007：21-25）。而陶传进对于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之间矛盾的论证，更是主要引用了奥尔森的主要观点来对其进行批判。著名的经济学家奥尔森发现了集体行动的困境，通过对复杂世界的观察，他发现之前大家所公认“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形成的集团，均有进一步扩大集团利益的倾向”的观点是错误的。集团利益的共同性导致“搭便车”现象，理性的经济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而后他对集团进行了细分，分为相容性集团和排他性集团，并提出相容性集团较排他性集团更有可能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的观点。陶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带来了人们自主能力的提高，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人们自利心理的增强，从而最终损害了人们的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破坏了公民社会建设所需要的基础。因此，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称为了学术界争论的一件“悬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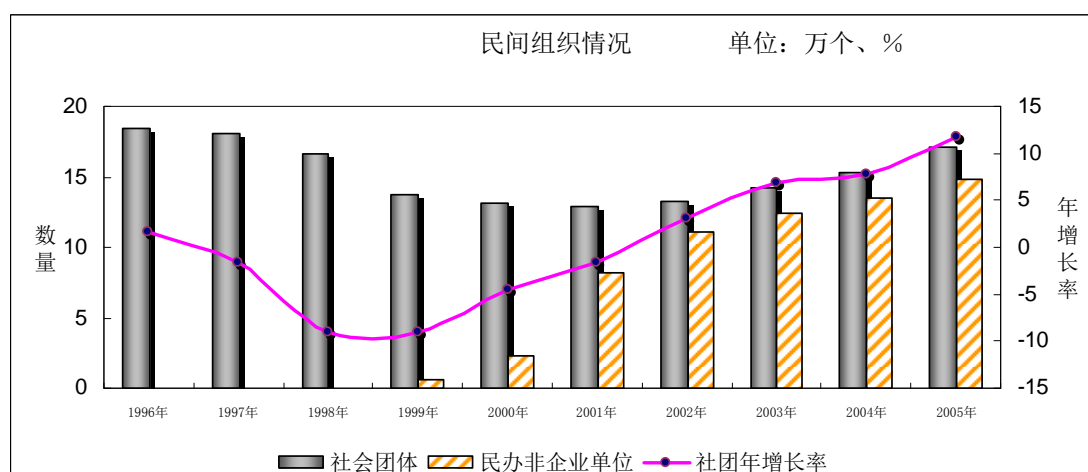
## 二、市民社会与社团参与

在当代市民社会与社会资本研究中，美国学者普特南的研究得到了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普特南（Robert D. Putnam）提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

资本提高了投资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 (Putnam,1993)。社会资本的存量就是一个社区中人们参加、参与社团活动的水平, 指标包括读报、参与志愿组织以及投票等。“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等……都属于密切的横向互动。这些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通过这种社会参与, 个人与社会连接起来, 由此产生的社会资本是西方公民社会得以成型和运作的基础。社会资本产生于志愿性社团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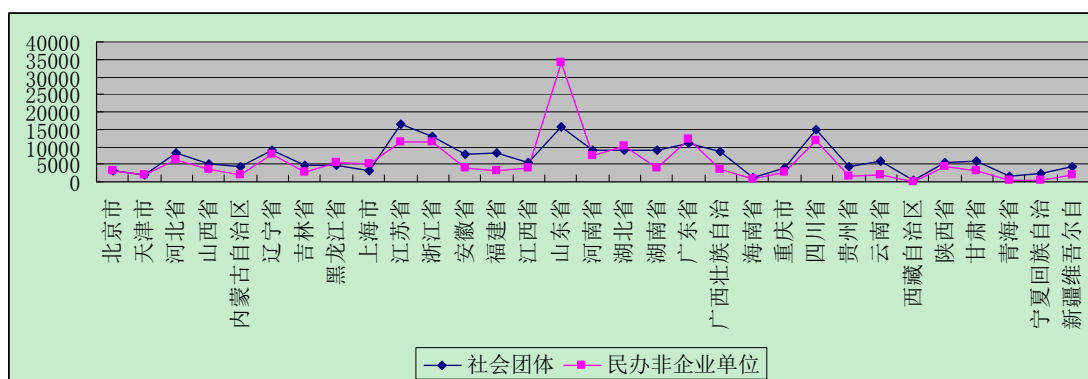
因此在普特南的研究中, 社团被认为是推动公民之间的合作的关键机制, 并且提供了培养信任的框架。他同时分析了作为公民参与网络的社团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在一个共同体中, 此类网络越密, 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其次, 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 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 促进了交往, 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的流通, 还体现了以往合作的成功, 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 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第三, 密集但彼此分离的垂直网络维持了每一个集团内部的合作, 而公民参与网络则跨越了社会的分层, 滋养了更广阔的合作。因此, 普特南提出“如果说, 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参与者解决集体行动困境, 那么, 一个组织的建构越具有横向性, 它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 (Putnam,1993: 203-204, 206)。这样, 社团参与对于普特南眼中公民社会的发展无疑是具有最为重要意义的社会机制。

图一：1996-2005 年间民间组织发展情况



来源：民政部数据统计年报 2006 年

图二：至 2008 年第一季度为止各省、直辖市社会团体与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



来源：民政事业统计季报（2008年1季度）

在当前中国，中国的社团数量在增加，种类在增多，社团的理论研究也有长足进展。从图一和图二的现实显示了，在 1999 年之后，我们国家的社团和民间组织得到了高速的发展，然而从图二中我们看到，这种发展在省际之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如果我们从普特南的社团理论出发，这也就意味着在当代中国，不同的地域空间中，公民社会的发展是非平衡的。因此这也就提出了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那么是否是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就了这种非平衡性呢？那么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宏观力量是如何对于公民参与网络产生影响的呢？

### 三、数据与测量

#### （一）研究设计

基于以上的理论讨论和研究思路，我们提出了以下的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一：**个体的自主能力对市民社会发展具有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二：**在当代中国，控制了个体自主能力的影响后，市场经济发展对市民社会发展具有负向影响。

**操作化：**

- 1、在这里，我们将个体自主能力的概念操作化为两个方面的指标：教育和收入。
- 2、我们将“市场经济发展”的概念通过市场化程度指数来进行具体的量化。
- 3、通过对普特南研究的借鉴和引申，我们将“市民社会”的概念定义为一个地区居民的社团参与水平。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个推论。

**推论 1：**教育程度越高的社会成员，其对社团参与程度越高。

**推论 2：**收入水平越高的社会成员，其的社团参与程度越高。

**推论 3：**在当代中国，当控制了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成员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效应后，市场发育程度对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具有负向影响。

#### （二）统计模型与使用数据

在本研究中使用了多层次模型的统计方法，其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个体层次模型

$$Y_{ij} = \beta_{0j} + \beta_{1j}X_{1ij} + \beta_{2j}X_{2ij} + \dots + \beta_{kij}X_{kij} + \Gamma_{ij}$$

其中在分析中，个体层次的主要变量为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收入、婚姻、职业、政治面貌、社区类型。

省份层次模型

$$\beta_{0j} = \gamma_{00} + \gamma_{01}W_{1j} + \gamma_{02}W_{2j} + \dots + \gamma_{0m}W_{mj} + u_{0j}$$

$$\beta_{1j} = \gamma_{10} + \gamma_{11}W_{1j} + \gamma_{12}W_{2j} + \dots + \gamma_{1m}W_{mj} + u_{1j}$$

在二水平的省级层次，主要的变量为市场化程度。其对于因变量的影响主要在两个层次上，一是截距层次上，即  $\beta_{0j}$  方程所示，二是在斜率层次上，即  $\beta_{1j}$  方程所示，其分别反映了二层次变量市场化程度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通过对个体层次变量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因变量的变化）。

本文主要使用了 CGSS2005 年数据中的居民问卷进行研究。数据样本 10376 个。

#### （三）测量变量

## 1、因变量

因变量主要通过对几个问题进行的因子分析后得到社团参与因子获得。问卷中具体的问题为：在业余时间里，您有没有在以下方面参加由您工作单位以外的社团组织（如俱乐部沙龙，培训班，志愿团体，教会等）安排/进行的活动呢？问题选项为量表测量，在这里我们将从不，一年几次，一月一次，一周一次，一周几次，赋值为0到4后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了以上的社团参与因子。

## 2、自变量

### (1) 个体层次变量

一些研究也发现了社团参与和一些个体变量的影响，如参与教会、宗教信仰、教育、收入水平、性别和婚姻状态、居住的社区类型等因素（Curtis,1971;Cutler,1976;Greeley,1997; Knoke,1986;Knoke&Thomson,1977;Scott,1957）。英格哈特发现社会越工业化，个体教育水平和财富收入越多，强调“超物质”价值的生活状态，容忍度和信任，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社团发展。（Ingelhart&Baker,2000）。个体层次的变量主要包括类别变量中的性别、婚姻状况、职业状态、政治面貌、居住社区类型，以及连续变量中的年龄，年龄平方（以探寻年龄变量的非线性效用），受教育年限，收入对数。其中除了受教育年限与收入对数作为我们所要探寻的假设变量外，其他个体层次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我们的统计模型。

表1： 社团参与因子

项目	社区参与	共量
E18a. 健身/体育活动	.503	.710
E18b. 娱乐/文艺活动	.547	.739
E18c. 同学/同乡/同行联谊活动	.545	.738
E18d. 宗教信仰活动	.029	.169
E18e. 有助于增进培养/教育子女能力的活动	.364	.603
E18f. 有助于提高个人技能/技术的活动	.592	.769
E18g. 公益/义务活动（如扶贫、社会救济、赈灾、扫盲、环保等）	.539	.734
特征值	3.118	
平均方差	44.539%	

表2： 个体层次变量基本描述统计

类别变量			类别变量				
	样本数	有效百分比(%)		样本数	有效百分比(%)		
性别	男性	5463	52.6	居住社区类型	城市	6098	58.8
	女性	4919	47.4		农村	4274	41.2
婚姻状况	无配偶	1599	15.4	连续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有配偶	8771	84.6		年龄	44.7011	14.79441
职业状态	非在职	2452	23.6		年龄平方	2217.0434	1417.41983
	在职/在学	7920	76.4		受教育年限	8.050622	4.517366
政治面貌	非党员	9252	89.2	收入	741.2038	1280.40741	

党员	1120	10.8	收入对数	5.4976	2.22638
----	------	------	------	--------	---------

## (2) 省份层次变量——市场化

在本研究中，我们选用了市场化指数来反映各地区之间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如表 3 所示，这里的市场化指数主要来自于樊纲于 2006 年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06 年报告》，其中指数的构造主要通过五个方面的内容形成。其中分别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樊刚、王小鲁、朱恒鹏，2006：13-76）。

表 3：2005 年各省市场化程度指数

省份	市场化指数	省份	市场化指数
甘肃省	4.44	湖南省	6.55
贵州省	4.57	安徽省	6.56
陕西省	4.8	湖北省	6.65
新疆自治区	5.02	四川省	6.86
山西省	5.26	重庆市	7.23
黑龙江省	5.26	辽宁省	7.84
云南省	5.51	山东省	8.21
内蒙古自治区	5.52	天津市	8.34
海南省	5.54	北京市	8.62
广西自治区	5.82	福建省	8.62
吉林省	5.89	江苏省	9.07
河南省	6.2	浙江省	9.9
江西省	6.22	广东省	10.06
河北省	6.41	上海市	10.41

## 四、研究发现

### (一) 社团发展的地区差异

表 4 社团参与的地区间比较 (Logistic regression N=10372)

社团参与				社团参与 (包含控制变量)			
省份	$\beta$	省份	$\beta$	省份	$\beta$	省份	$\beta$
天津	-.041	河南	-.637***	天津	-.062	河南	-.150***
河北	-.402***	湖北	-.413***	河北	.042	湖北	.038
山西	-.473***	湖南	-.034	山西	-.051	湖南	.291***
内蒙古	-.179**	广东	.023	内蒙古	.231***	广东	.317***
辽宁	-.511***	广西	-.364***	辽宁	-.154**	广西	.031
吉林	-.479***	海南	-.060	吉林	-.129*	海南	.218**
黑龙江	-.551***	重庆	-.769***	黑龙江	-.255***	重庆	-.324***
上海	.184***	四川	-.739***	上海	.131**	四川	-.163***
江苏	-.478***	贵州	-.499***	江苏	-.093*	贵州	-.045
浙江	-.278***	云南	-.379***	浙江	.213***	云南	.035
安徽	-.522***	陕西	-.028	安徽	-.140**	陕西	.293***
福建	-.037	甘肃	.254***	福建	.274***	甘肃	.617***
江西	-.827***	新疆	-.154	江西	-.267***	新疆	.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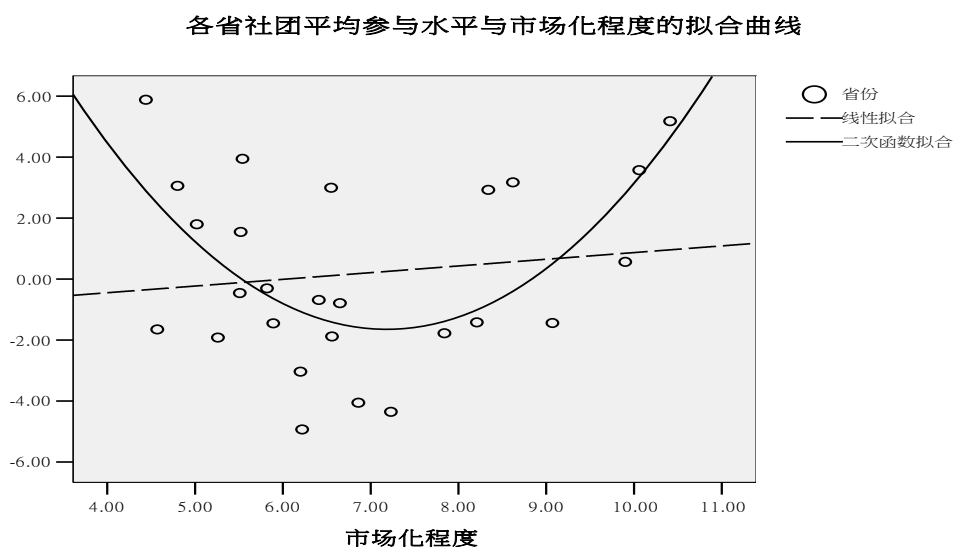
山东	-.476***			山东	-.106*		
Adj-R <sup>2</sup>	.0761			.2652			

注：北京为参照组；\*P<.1; \*\*P<.05; \*\*\*P<.01 (双尾检定)，表中控制变量结果省略。

由于各省之间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异，那么是否就意味着不同地区之间的公民社会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呢？表 4 的两个方程模型反映了社团参与水平的地区差异。第一个模型是以社团参与为因变量，省份作为自变量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其中以北京作为参照组。我们看到社团参与水平高于北京的省份有上海、广东、甘肃。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并没有纳入控制变量，因此这个模型表明了各省之间社团参与平均水平的差异。而第二个模型则是包含了控制变量的以社团参与为因变量，省份以及相关控制变量的方程模型。模型二显示出以北京作为参照组时，社团参与水平高于北京的地区有内蒙古、上海、浙江、福建、湖南、广东、海南、陕西以及甘肃。

通过上面两个模型的结果，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社团参与水平高于北京的省份中，既有市场化程度高于北京的福建、广东、浙江，同时也有市场化程度低于北京的内蒙古、湖南、海南、陕西、甘肃。那么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与人们参与社团的程度是一个不均衡性的发展。在图三中，通过对各省社团参与水平与市场化程度的拟合线的观察，我们更加清晰的看到了这一现象。各省社团参与的平均水平与市场化程度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而是一个非线性的关系。其表现为一个开口向上的正 U 型曲线。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推进，人们的社团参与水平是一个先下降再上升的过程。

图三： 各省社团平均参与水平与市场化程度的拟合曲线



线性拟合： $R^2=.016, F=.339, Sig.=.534, df_1=1, df_2=24, Y=-1.326+0.220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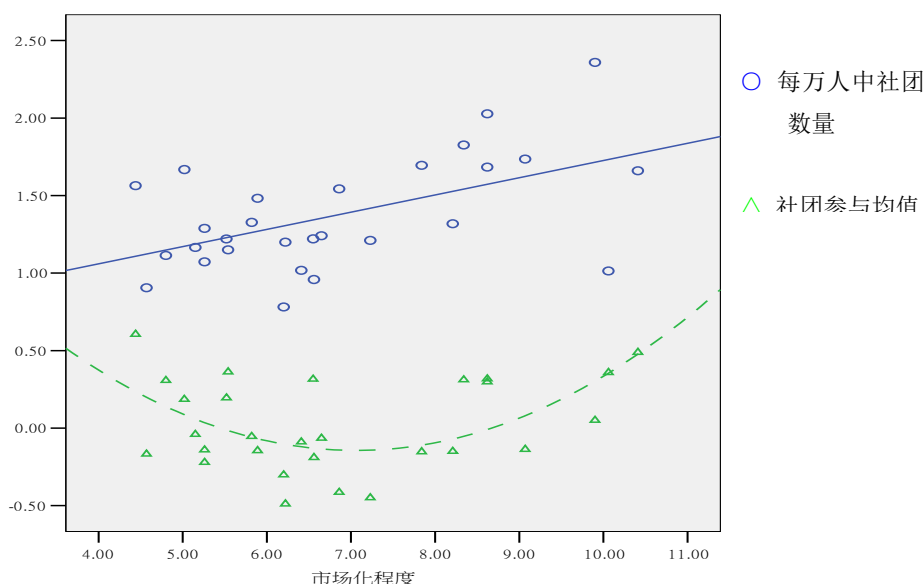
二次函数拟合： $R^2=.358, F=6.418, Sig.=.006, df_1=2, df_2=23, Y=29.497-8.671X+0.604X^2$

图四： 各省社团数量与社团参与水平的比较

在图四<sup>①</sup>中，我们将各省份每万人中的社团数量与各省份的社团平均参与水平进行了比较。我们发现，二者同样不是一个同步发展的过程的，如果说每万人中的社团数量看做是一

<sup>①</sup> 关于各省社团数量分布情况，来自于国家民间管理局网站<http://www.chinanpo.gov.cn/web/index.do>。这里我们根据各省人口状况，根据公式：各省每万人中社团数量=(各省社团数量/各省人口数量)×10000 得到，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各省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的数量指标。

种宏观结构的话，但是在作为人们行动表现的社团参与上，却没有得到相互的对应。从结果上可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程度越高的省份，人均拥有社团的数量是不断上升的。这与社团参与和市场化程度的关系是具有差异的。那么，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种差异性呢？因此，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统计模型中，考虑宏观变量对微观行动的影响。



## （二）居民社团参与的影响因素

表 5 的结果显示了影响居民社团参与水平的不同层次变量的作用。在三个模型中，个体层次变量均对居民社团参与程度有显著影响。在性别上，女性较之于男性，拥有更高的社团参与水平，帕米拉的解释是女性比男性更加倾向与加入性别隔离的群体，同时具有更高的社团忠诚度，从而提高了其社团参与的水平。我们的研究结果同时显示了年龄对于社团参与的影响呈现出开口向上的正 U 形曲线。这说明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的社团参与水平是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政治面貌上，党员比非党员的社团参与水平更高，而婚姻状况中，无配偶的比有配偶的居民倾向于拥有更高的社团参与水平。同时我们也看到，农村居民的社团参与水平要高于城市居民。

在这里，我们更加主要关注的变量是收入水平、教育程度以及省级层次变量市场化程度。在三个模型中，对于收入和教育而言，都呈现出了相同的结果，那就是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越高，则居民的社团参与水平越高。我们的研究假设一和推论 1、推论 2 得到了证明。柯提斯等学者在研究不同国家社团发展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其对此的解释是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越高，意味着个体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参与到社团生活中来（Curtis & Grabb, Baer, 1992）。而罗纳德和贝克对此的观点则是，社会越工业化，个体教育水平和财富收入越多，越强调“超物质”价值的生活状态、容忍度和信任，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社团发展（Ronald & Wayne, 2000）。

而对于市场化程度这一省际层次变量而言，我们看到三个模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结果。在模型一中，市场化程度对于居民的社团参与不具有线性的影响。这与我们之前对于不同省份之间的社团参与水平比较的结论是一致的。在模型 2 中，我们在宏观层次变量中加入了市场化的平方项，来探寻其对于社团参与的非线性效应。结果也同时印证了我们在前文中的研究结论，市场经济发展对于社团参与水平提高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其表现为一个开口向上的正 U 型曲线。因此，我们基于假设二和推论 3，在方程中加入了市场化程度与收入和教育的交互项，交互项说明了市场化程度与收入和教育之间的内在关系。模型 3 印证了我们的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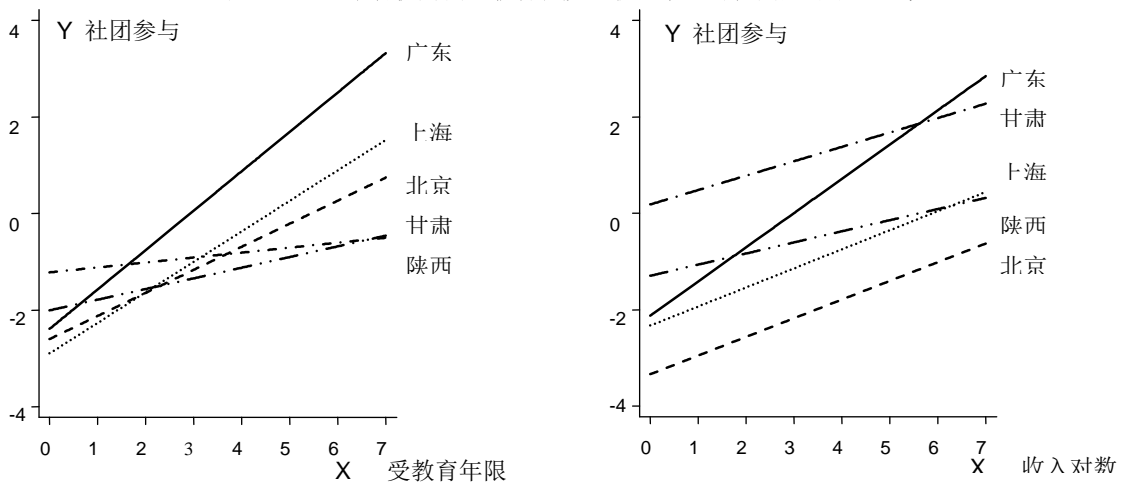
设。我们看到交互项的影响为正，这表明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带来了人们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从而对社团参与程度产生了正向影响。然而在此时，控制了这种人们自主能力的提高后，我们发现在模型 3 中，市场化程度对于社团参与程度的影响变成了一种负向影响。这样我们的研究假设二和推论 3 也得到了证明。

表 5 影响居民社团参与程度因素的多层次模型

影响居民社团参与程度的因素分析 (Multilevel Statistical Model N=10372)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个体层次变量	$\beta$	S.E	$\beta$	S.E	$\beta$	S.E
性别 <sup>a</sup>	-.036 <sup>1</sup>	(.018)	-.036*	(.018)	-.029 <sup>1</sup>	(.018)
年龄	-.023***	(.004)	-.023***	(.004)	-.024***	(.004)
年龄平方/100	.020***	(.004)	.020***	(.004)	.020***	(.004)
教育程度	.043***	(.002)	.043***	(.002)	.039**	(.020)
收入水平/100	.029***	(.004)	.029***	(.004)	.019**	(.008)
政治面貌 <sup>b</sup>	.196***	(.029)	.196***	(.029)	.190***	(.029)
职业状态 <sup>c</sup>	.159***	(.025)	.159***	(.025)	.146***	(.024)
婚姻状况 <sup>d</sup>	-.126***	(.027)	-.126***	(.027)	-.118***	(.027)
社区类型 <sup>e</sup>	.516***	(.023)	.516***	(.023)	.521***	(.022)
省级层次变量						
市场化程度	-.001	(.025)	-.605**	(.189)	-.037*	(.016)
市场化程度平方	---		.041**	(.013)	---	
交互项						
市场化*教育程度	---		---		.006***	(.001)
市场化*收入水平/100	---		---		.004***	(.001)
截距	-.362 <sup>1</sup>	(.192)	1.735**	(.672)	.958**	(.378)
模型拟合度 (BIC/df)	25598/13		25605/14		25481/14	

参照组: <sup>a</sup> 女性; <sup>b</sup> 非党员; <sup>c</sup> 非在职; <sup>d</sup> 无配偶; <sup>e</sup> 农村 <sup>1</sup> P<.10; \*P<.05; \*\*P<.01; \*\*\*P<.001 (双尾检定)

图五：以五个省份为例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对社团参与影响的拟合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一结论，图五的以五个省份为例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对社团参与影

响的拟合情况说明了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我们看到在图中，相对于甘肃、陕西而言，广东、上海、北京的拟合线具有较高的斜率，而甘肃、陕西具有较高的截距，这意味着从社团参与的水平来看，甘肃、陕西的社团参与水平具有较高的“基准”（以  $X=0$  时为基准）水平，然而随着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两个省份教育和收入对于社团参与的“贡献率”（斜率）上比其他三省更低，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人们教育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在未来可能的结果是广东、上海、北京的社团参与水平将逐渐高于甘肃与陕西。因此，这就意味着，在讨论市场经济发展对于公民社会的影响中，我们不但要看到不同市场状态下人们自主能力提高对于公民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同时也要注意一种发展的“基准”。

## 五、结论与讨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从而带来了人们自主能力的提高，使得公民社会的发展成为了可能。然后当我们将这种自主能力控制了之后，从宏观的表现上看，公民社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也产生了一种抑制的效应。因此，我们认为，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下，随着人们自主能力的提高，公民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然而，公民社会的建立不仅仅是一个人们能够拥有更多支配空间和时间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也是一个具有合作精神和相互信任的公民参与网络的建设过程。

因此，我们分析认为，之所以当排除了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个体自主空间扩展的影响后，市场经济对公民社会所具有负向效应的原因，应该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市场经济建立的不只是一种人们能够有更多空间争取自我利益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培养人们关心他人，乐于合作，相互信任的过程。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开篇的就写到：“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亚当·斯密，1997）”。怜悯之心和同情之心是亚当·斯密对于人性的第一个假设，只有在这个第一假设之上，人类“自利性”的第二假设才能保证人类不会自我毁灭。可以说，对于斯密来讲，人的第一性是同情、怜悯之心，第二性才是自利之心。二者是完全可以相容的，同情、恻隐之心是自利之心的基础，在二者的自然作用之下，人类就会克制的追求自身的幸福。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亚当·斯密对于人性的第一个假设正表现为一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合作精神与信任，只有这样，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才能真正意义上带来公民社会的产生。

其次，我们要改变一种中国社团发展和参与之间的不平衡性。事实上，当前中国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两重性。因此，我国民间组织正在形成，具有某种程度的过渡性，许多方面还极不规范。这就需要从国家政策的层面上给予更多的资源于当代社会组织的发展，从制度上发展更多有利与社团活动展开的空间，从而最终改变地区间公民社会发展的差异，真正做到数量与水平上的“形神合一”。

### 参考文献：

- 黑格尔，《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
-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 托马斯·潘恩，《人权论》，载《社会与政治原理》，迈克尔·基梅尔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高丙中,《社团合作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有机团结》,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高兆明,《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家族精神的破灭——兼论“市民社会”研究进路》,《学海》,1999年第3期。  
储建国,《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田忠,《经济市场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理论与改革,2001年第2期。  
方朝晖,《对90年代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反思》,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张喜红,《社会团体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长白学刊,2007年第3期。  
陶传进,《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一种批判的视角》,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  
罗伯特·D·普特南,2001,《让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格奥尔格·西美尔,《大都市和精神生活》,载《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郭子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樊刚、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Almond, Gabriel&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uthnow,Robert.1991."Tocquenville's Question Reconsidered: Voluntarism and Public Discours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Pp.288-308 in *Between States and Markets: The Voluntary Secto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ited by R.Wuthnow.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urtis,James.1971."Voluntary Association Joining: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Not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and Grabb,Edward&Baer Douglas.1992."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in Fifteen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7.

Curtis, Stephen J.1976."Age Differences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Social Force* 55.

Greeley,Andrew.1997."The Other Civic America: Religion and Social Capital." *The American Prospect* 32.

Knocke,David.1996."Associations and Interest Group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2.

Knocke,David& Randall Thompson.1977."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Trends and the Family Life Cycle." *Social Force* 56.

Scott, John C.1957."Membership and Participation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2.

Inglehart, Ronald&Wayne Baker.2000."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65.

Schofer, Evan&Fourcade G.Marion.2001."The Structural Contexts of Civic Engagement: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66.

Pamela A.Popielarz.1999."Voluntary Association: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Gender Segregation in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Gender and Society*13.